

【名家背影】

□吕家乡

解放前我在徐州上高中的时候,就听语文老师说过臧克家(1905-2004)是“和艾青齐名的新诗大家”,但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解放后,1949年秋,我考入青岛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入校不久,就在人民日报读到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篇《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浅显又深刻的警句,一时广为传诵。这时我还听说臧克家也是山东大学的学生,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徒,于是到图书馆借到了他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反复诵读揣摩。“日头堕到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对这一类苦吟而得的佳句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名篇长诗《罪恶的黑手》是为青岛的一个教堂而作,我打听到教堂的所在,曾经特地去参观。每逢从“一多楼”前走过,也会不由得想到闻一多先生的爱徒臧克家。1957年,《诗刊》创刊,由臧克家任主编,创刊号刊出了毛泽东写给臧克家等的亲笔信影印件,一个诗人能够获得如此荣耀,更让我敬仰不已。那时我也喜欢写诗,正在铆足劲儿准备向《诗刊》投稿,不料反右狂风卷起,我被错打为“右派”。臧克家先生在历次运动中则一直是相当活跃的积极分子,我只能遥望仰慕了。

1981年,我已获得新生,在田仲济先生指导下从事新诗教研工作,通过田先生介绍,给臧克家写信,借阅他的几本早已绝版的诗集,他很快寄来。我研读了几个月,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评论文章,还书时一并寄给他,请他指教,暗暗地巴望着能够得到他的首肯,甚至推荐发表。他很快回信,除了肯定我“研读认真”之外,中肯地指出了文章的缺点:对几本诗集平均用力,没有重点,也没有深度。希望我找出代表性诗篇,深入钻研,形成自己的见解;至于写论文,则要以问题为中心,有

怀念臧克家先生

我感佩臧老的宽容,想到他曾赞赏郑板桥的一副楹联,专门著文推荐:“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的文章的确不是泛泛之词,而是真正身体力行的。



理有据地展开论述。这封信不管一瓢浇头的冷水。我把来信给田先生看了,他笑着说:“苦口良药,忠言逆耳呀!我冷静下来,逐渐从来信中获得了研读和评论诗歌的启蒙,并体会到了这位诗坛前辈的严格和热诚。继续用功之后,我于1983年写出了《臧克家抒情诗的形象构成》和《臧克家诗歌语言和体式的演变》两篇文章,考虑到臧老年事已高,不便打扰,发表前没有请他过目。发表后,田先生说:‘臧老看了你的两篇文章,很满意,觉得你写出了自己的新意。1986年,臧克家诗歌研讨会在济南召开,八十多岁高龄的臧老亲自到会。我因岳父病危,没能参加,也没去拜访臧老,只提交了一篇文章《臧克家的叙事诗、报告长诗和讽刺诗》,对于所论的作品不满多于肯定。我真有些惴惴,怕惹得臧老不快。后来问田先生,他说:‘臧老看了你的论文,觉得你的看法有道理。我感佩臧老的宽容,想到他曾赞赏郑板桥的一副楹联,专门著文推荐:‘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

的文章的确不是泛泛之词,而是真正身体力行的。

1988年春,江苏文艺出版社来信邀请我到南京参加该社准备出版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定稿会议。这部大辞典的顾问是臧老,主编是吴奔星先生,定稿人有丁国成(《诗刊》社)、杨光治(花城出版社)等名流共八人。我估计自己能够受邀大概是吴奔星先生的照顾,报到时向吴先生致谢,吴先生却说:“你不要感谢我,是臧老点名要你来的。”又说:“臧老说看过你写的几篇论文,你对他的诗有赞扬,有批评,臧老觉得你言之有据、学风踏实!”我听了,又感动又惭愧。吴先生说:臧老做这部辞典的顾问可不是挂名的,辞典的编选原则,选定的入典诗人名单、篇目,鉴赏文字的要求等等,他都认真过问。仅仅定稿会议这几天,就收到他的二十多封信。他特别嘱咐,自己的入选篇目数量不能超过艾青,还特别嘱咐,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为唯一标准,对于任何流派和诗人,包括朦胧诗人,都要在这

个标准下一视同仁,杜绝任何门户之见。臧老曾经对朦胧诗发表过比较苛刻的个人意见,但在他指导下编写的这本辞典却切实做到了兼容并包,没有夹杂任何偏见。

1990年,山东教育学院的周敬山老师编选了两本面向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书《语文名篇精析》和《文言文全解》,盼望臧老题写书名,托我写信介绍,准备带着润笔费和厚礼到北京登门拜访。我说:臧老不爱财是出名的,听说他的墨宝择人而赐,不给就是不给,万金难求;给就给,分文不取。臧老很重乡情,对于山东老乡的要求总是优先考虑,只怕他身体条件不允许劳累了。我试探地写了一封信,令人惊喜的是,不久就接到臧老的回信,挂号寄来了书名的墨宝。这两本书分别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面世。周敬山激动地说:臧老的题字不仅给两本书增色,而且对两书的顺利出版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臧克家也不可能摆脱时代潮流的裹挟。尤其是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约谈,与领袖切磋诗艺后,受宠若惊的沉醉和个人迷信的增长不能不导致清醒理性和艺术个性的丢失,从而大大限制了他创作才能的发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发表过一些失真的表态诗文。他去世后出版“全集”时,许多这类诗文竟然付之阙如,似乎在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中臧克家都是无声无息的。这使“全集”失去了应有的全貌,减损了文献价值。也许编者出于“为贤者讳”的好心吧,其实未必符合臧老的意愿。臧老决不护短,对于自己的或闪光或歪斜的脚印,一定都会认真面对,坦诚地把自己的本真面目交给历史和后人。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朱家的日记

海盐朱希祖身兼历史学家和藏书家,他早年师从章太炎,是为“章门五王”之一,而其一生勤于治学,笔耕不辍,著述丰赡……

场景——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曾昭燏女士(“文革”前在灵谷寺跳塔,陈寅恪先生闻之撰有《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历史学家钱海岳(“文革”中由明孝陵跃身而下)以及朱楔(“文革”中弃世于南京图书馆前)。朱楔先生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主任以及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文管会副主任、省图委会副主任等,还主持出版了关于江浙海塘建筑史、中国运河史料辑辑以及郑和、郑成功、玄奘等的资料,1956年他为保护明城墙上书,结果于翌年居然成为右派分子。《朱希祖日记》没有收入他的日记,估计是没有保存下来,或者其时已不是书写日记的时代了。

读了朱希祖女儿朱倩和朱岱的日记,不料竟也是为之痛心不已。朱希祖长女朱倩的日记,仅是1917年10月25日至12月22日的日记,其时她年仅16岁,不料翌年竟病逝不起,这位“文官殿恩考”等,显然是继承了父业并有所光大,以上这些著作近年来再版了许多,特别是南京史地方面的论著。

去年春夏,笔者带小女由杭赴宁旅游,初衷却是为了目见和体验几位前辈弃世时的

(未刊)中曾写道:“我的家庭里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故,我的大姊因患肺结核到了第三期,不治逝世。她死的时候才十六岁,引起了一家人的极大悲哀。她从小有‘女神童’之目,七岁就能背诵《长恨歌》,十岁就能作古文。父亲对她加意培养,亲自教读,一心一意想把她教成一个班昭、李清照一样的女学者或女诗人。可是她小用功过度,身体就吃了亏,每天晚上还要替父亲抄写《中国文学史》讲义,到十点或十一点钟才能睡,竟得了肺结核,从她十二岁那年起,就开始吐血。后来虽两次进法国医院治疗,还是不能见效。她好像含苞待放的蓓蕾一样,被无情的暴风雨摧折了。父亲失去了爱女,非常伤心。经过这次打击,他才觉得以前的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是不对的;青少年儿童应该德育、智育、体育并重,不能关在书房里读死书,弄得死气沉沉,甚至影响身体。于是他教我们搞体育运动,提倡打乒乓球、踢足球,并带我们出去旅行,接触大自然的美景,认识祖国壮丽的河山。”

晚近中国社会转型,世家女子大多如此,朱希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他的

忏悔和内疚带来家风的变革,这是一个文化世家的故事,也是才女命薄的陈旧故事了。

朱希祖的另一个女儿朱岱,出身于北京女师大预科,后攻读历史学与图书馆学,1925年转入北大深造,1929年又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1935年嫁罗香林,194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又任教于广州文化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9年移居香港,晚年皈依基督教,其曾著有《班昭》、《东林党研究》、《明季社党研究》、《明季桐城中江社考》等。朱岱的日记也清新可喜,其中一些作为民国谈屑,也不无可补。如:

“袁世凯喜用贪诈之人,无术之徒,可晒之事,笔不胜书。家君所述,最信任内务总长朱启钤,朱喜逢迎,酿成帝制,最为有力。平日专兴土木,经营中央公园,不遗余力。其女乃在园中肆意淫荡,自由逐牡。而朱氏最喜构造厕所,天安门左右各造厕所一,每厕费四千金。改建正阳门为三门,门左右各造厕所一,题曰官厕所。落成之后有人譏之袁氏,谓国门左右大营粪窟,岂欲为国家遗臭耶。朱乃急将官厕所三字铲去,将厕所改为京汉京津铁路警察分所云。”(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书法是在实用汉字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虽曰书画同源,但不同之处在于:从源头上讲,绘画是以现实中存在的原型为依据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汉字或书法则不一定,如果说有些字也是像绘画一样依据实物表现的,那也只是抽象的表现,而已经远非实物本来的样子了。尤其当书法艺术发展到用纯抽象的线条作为艺术表现手段时,人们对书法的描述,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比喻,而且即使是比喻,也仍有一些让人不知所云,这正如古人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比起绘画来,古人更多地使用比喻来描述书法,纵观历代论书之句,比喻可谓比比皆是。当然其中有些比喻过分玄奥,竟然连北宋的职业书法家米芾也感觉一头雾水,难怪他在《海

【书法茶座】

蛇与蛤蟆:

苏黄的书法调侃

□杨加深

岳名言》中发牢骚说:“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古人的书法比喻中,有褒扬的,有贬斥的。其中,贬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一本正经的,这是真正地贬低;也有调侃式的,亦真亦幻,其中的真意就要我们自己来取舍了。此类书法比喻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北宋年间发生在苏轼和黄庭坚之间的一则玩笑。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大致意思是说,苏轼对黄庭坚说:“庭坚啊,你近来写的字虽然清劲,但有时写得太瘦,简直就像挂在树梢上的蛇。”黄庭坚说:“苏老师的字我当然不敢妄加评论,但有时也觉得肥扁,很像是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二人相对大笑,认为对方说中了自己的缺点。

不可否认,苏东坡和黄庭坚,既是北宋的书法大家,也是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毫无疑问,他们的书法都达到了开宗立派的高度。但开宗立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具备有别于前人的面貌与风格,即自己独到的特点,这是开宗立派的一个标志性条件;另一方面,在具备了自身特点也就意味着突出自己特色的同时,很有可能又暴露出新的毛病。苏、黄二人均是如此。苏东坡书法的最大特点是肥扁朴拙,明代人项穆夸大苏字的丑,说其书法“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黄庭坚书法与苏轼截然不同,而是笔画瘦长且多波折。所以用“石压蛤蟆”和“树梢挂蛇”来比喻苏黄二人的书法,着实是再生动形象不过了。

我们再分析一下苏、黄二人受到对方调侃后的反应。“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也就是说,苏、黄二人没有恼怒,没有不快,也没有尴尬,而是开怀大笑,认为对方深深说中了自己的书法弊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能反映一种大家风度。或许有人说,这有什么,玩笑嘛!我要说的是,在现实中,能做到苏、黄般大度的恐怕不多。一般说来,书法家叫人看自己的作品,最希望听到的往往是赞赏,而不是他们口头上所谓的请赐教、请指正等。所以,当别人哪怕是晚辈请我们指点其书法时,除非是特别熟悉又真诚的人,我们一般都会考虑对方的面子与心理承受能力。我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位练书者才几天的拿着自己的作品向一位书法家请教,书法家看透了了他的意图,心想,如果我说他好,就有悖于自己的良心;如果说他不好,就可能很尴尬。于是就说,你的字写得真黑啊!这很像是鲁迅《立论》中描写的那段给别人儿子过满月,既不想说谎又不想遭打的经典台词。

学好书法,除自身的天分与努力外,还要真诚地与同行交流,向大家请教,虚心倾听人家的看法,这样才有可能长进快。苏、黄二人在辈分上有长幼之别,黄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年龄上相差8岁,这种亦师亦友之间的坦诚戏谑,不但没有遭到后人的诟病,反而成了千古美谈,苏、黄胸襟之坦荡、待人之真诚与大家之风范,是很值得我们这些书法人深思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故纸遗珍】

□散木

去年年末的一件开心事是继续阅读了顾颉刚、邓之诚的日记后,又阅读了《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

海盐朱希祖身兼历史学家和藏书家,他早年师从章太炎,是为“章门五王”之一,而其一生勤于治学,笔耕不辍,著述丰赡,他在国语运动、提倡白话文、倡导新文化、建构史学教育体系、建立学术团体、历史档案整理、历史遗迹调查及史馆修史、南明史研究等许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在其日记中有呈现。正如整理者所称:他的日记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史料。

《朱希祖日记》还附录有朱希祖两位女公子朱倩和朱岱的日记,又如整理者所说:这些资料正好补朱希祖日记之缺。笔者此前只知道朱家的公子朱楔先生,其从北大毕业后又读书于德国柏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著有《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中国财政问题》、《金陵古迹图考》、《元大都官殿图考》等,显然是继承了父业并有所光大,以上这些著作近年来再版了许多,特别是南京史地方面的论著。

去年春夏,笔者带小女由杭赴宁旅游,初衷却是为了目见和体验几位前辈弃世时的